# “文化强国”背景下辽宁省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张笑楠，魏琳林

（辽宁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大连 116000）

**摘要：**促进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耦合发展对推动文化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分析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博产业的耦合关系，构建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博产业的耦合协调模型，并计算2012—2022年辽宁省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的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研究发现：辽宁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博产业综合评价指数呈上升趋势，文博产业综合评价指数小于历史文化资源的综合评价指数；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博产业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稳步演进，已进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

**关键词：**历史文化资源；文博产业；耦合协调；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03－0122－09

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国家已出台系列纲领性文件进行谋划部署。在这一战略引领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对文化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明确提出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的供给体制，积极推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途径和关键支撑。历史文化资源是指以“历史”为核心的文化资源，蕴含着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博产业是指文物艺术品及其衍生品和博物馆市场化发展所形成的文化产业。在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文博产业表现出极大的可持续发展潜力，不仅为文化传承和教育提供新思路、新途径，也为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力支持。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息息相关，为文博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资源基础，而文博产业则为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提供了丰富的载体和平台，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为增强国民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辽宁省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且独具特色，涵盖了古代文明、近代革命文化、工业遗产等多个方面。这些资源共同构成了辽宁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为辽宁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近年来，辽宁省文博产业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独特的产业特色。一方面，各大博物馆通过线上线下结合、馆内馆外互动方式，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特色文化活动，博物馆系统的文创产业持续提质升级；另一方面，辽宁省整合各类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了一批具有特色的文旅项目和文化产业园区，不仅促进了文博产业的快速发展，也提高了辽宁文化的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辽宁如何依托其历史文化资源特色优势，促进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展现辽宁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成为辽宁文博产业发展亟待解答的“时代问题”。

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耦合协调机制是什么？如何促进两者耦合协调发展？当前，鲜有文献对这一重要命题进行深入研究，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文博产业的发展和数智化等方面。

(1)关于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Gourley[1]探讨了如何在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实用经济价值，在生态保护和历史保护之间实现更大的平衡。Alison[2]则聚焦于为历史

**收稿日期：**2025-08-17

**基金项目：**2023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L23BZS002)

**作者简介：**张笑楠(1980—)，女，辽宁阜新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通信作者魏琳林(2000—)，女，山东烟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

文化遗产增添特色,并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法。Pearson 和 Thompson[3]在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中确定了 3 个潜在的协同效应,即在保护文化遗产和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开发水下文化遗产以获得经济上的利益最大化。张斓琪[4]以陕西省为例,探讨了该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所面临的利用与保护问题,提出必须在开发过程中采取科学合理的策略,以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平衡。陶善才[5]、张荣华[6]则从保护和开发模式的角度,研究了历史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化手段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了新的路径。王小霜[7]从技术应用的视角指出,数字化技术已被广泛引入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谢宏洋和李舒[8]从“智”化媒介可供性视角出发,提出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应通过智能生产、智能社交和智能移动 3 大维度实现更高效的传播。许瞳和章佳[9]则基于 CAVE 系统设计,探讨了虚拟现实技术在绍兴历史文化街区活化中的应用,提出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公众服务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2)关于文博产业的发展和数智化。以英国 John Howkins 的《创意经济》为基石,文创产业理论为文博产业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0]。Kalfas 等[11]以欧洲为例,探讨了文化创意产业对欧洲地区的影响,重点关注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贡献。虽然起步较晚,但国内学者也在努力构建文博产业的理论体系。梁雪[12]、张萌[13]结合区域文博产业的发展实践,分析了文博产业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提出了促进文博产业发展的策略。张振[14]则从发展模式与路径的视角,深入探讨了文博事业、文博创意产业以及产品开发的现状与未来趋势,为文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策略建议。在文博旅融合发展方面,黄磊[15]从文旅融合政策背景出发,系统阐述了文博专业与旅游业协同发展的现实意义与实施难点。王青[16]以山东省青州市为例,从产业协同与绿色发展的角度,探讨了文化、旅游与博物馆 3 大产业融合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毕颖华[17]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 VR 体验中心为例,对基于文博行业 IP 定制的沉浸式 VR 体验研发与应用展开研究,提出了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增长的科技与文化融合路径。在技术应用方面,顾斯豪[18]将虚拟现实技术与博物馆结合创造新的艺术展览形式,设计开发虚拟数字博物馆 VR 体验项目,为文博文化与工艺提供新的呈现方式。解学芳和张家淑[19]提出了数智时代中国式文博元宇宙高质量创新路径,发展中国式文博元宇宙以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现文博产业数字化转型。

学术界就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博产业的相关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学者们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的策略、模式和路径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但是关于以历史文化资源为核心的产业化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还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对文博产业发展前景、发展现状以及数智技术应用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但是对区域文博产业的发展研究尚不多见。同时,学术界对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博产业的研究大多是独立进行的,将两者纳入同一个系统框架进行分析的文献相对较少。当前“文化强国”背景下兼顾文化传承和产业发展两个方面,如何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合理开发并以此促进文博产业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基于现有文献系统梳理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之间耦合机理,并据此构建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耦合协调模型,对 2012—2022 年辽宁省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之间的耦合度及协调水平进行了评估和分析,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之间的关系,也为辽宁省文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 1 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耦合机理分析

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的耦合发展,其本质在于两者之间的互补与创新。历史文化资源为文博产业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文博产业则为历史文化资源提供了传承与开发的广阔平台,两者在融合中实现了互利共赢,这种融合表现为一种双向互动的耦合关系,即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其耦合机理如图 1 所示。

### 1.1 历史文化资源为文博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深厚的底蕴

作为人类文明的瑰宝,历史文化资源涵盖了历史遗迹、珍贵文物、艺术品、古籍文献等众多形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价值,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也是文博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首先,历史文化资源不仅让文博产业拥有了独特性和吸引力,还使得文博产业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能够满足公众对历史文化知识的需求和探索欲望。其次,历史文化资源是文博产业进行教育和普及的重要资源,通过展览、讲座、互动体验等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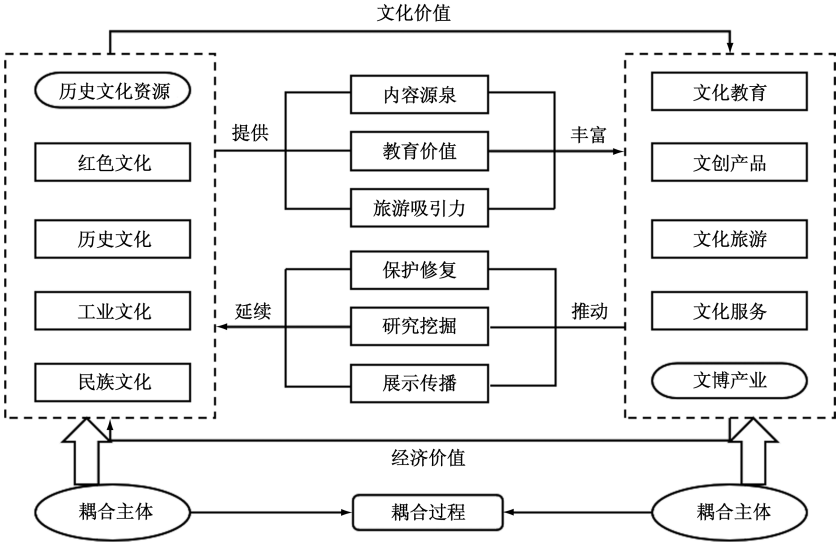



**图 1　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耦合机理示意图**

式，文博产业能够将历史文化知识传递给公众，提高公众的文化素养和历史意识。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来说，文博产业中的历史文化资源能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历史观和文化认同感。此外，历史文化资源是文博产业吸引消费者的重要因素。许多消费者选择参观博物馆、历史遗迹等文博场所，就是为了亲身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文博产业通过开发历史文化资源，可以打造出极具吸引力的旅游线路和文化体验项目，促进文博产业的繁荣。

### 1.2　文博产业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开发提供重要路径支撑

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博产业具有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变为公众能够感知和体验的文化产品，从而实现文化资源的共享与传播的重要功能。首先，文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可以支持专业的文物保护和修复技术的研究和进步，使得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得到科学的保护和修复，延长其寿命，历史文化资源可以长期留存并为后人所欣赏。其次，文博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培养专业的研究人员和文化专家，这些专家学者通过对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和挖掘，揭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为公众提供更深入、更全面的历史文化知识。不仅有助于深化公众对历史文化资源的理解，还为文博产业的展览和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此外，文博产业通过举办展览、讲座、互动体验等各类活动，将历史文化资源以直观、生动的方式展示给公众，让公众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感受中国历史文化资源，有效提升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力。

文博产业的技术创新，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展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数字化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等新兴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文博领域，不仅提高了文物保护的效率和准确性，也为观众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观赏体验。文博产业通过市场化运营，拓宽了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播渠道，让历史文化资源“活”起来，走进大众视野，增强了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点燃了公众对中华历史文化的热情与喜爱。

## 2　耦合协调模型构建

### 2.1　研究设计和方法

基于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的耦合特性，通过构建历史文化资源——文博产业系统的耦合协调模型，测算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首先，分别构建历史文化资源子系统和文博产业子系统的测度指标体系；其次，对指标的初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和非负化处理，采用熵权法计算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博产业测度指标体系各指标的权重，并采用综合评价法计算两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再次，构建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博产业系统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确定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以客观评估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

### 2.2　数据来源

为深入研究辽宁省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的融合进展和演变趋势，选择辽宁省 2012—2022 年的相关面板数据。历史文化资源子系统的关键指标数据主要源自辽宁省文化与文物局、辽宁省人民

政府门户网站、中华民族文化资源库网站、辽宁省图书馆网站以及辽宁政务服务网等官方平台;文博产业子系统中的主要指标数据主要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辽宁省统计年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同时参考了相关年份的《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插补法补齐。

### 2.3 模型构建

#### 2.3.1 指标体系构建

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和可得性原则,构建历史文化资源子系统和文博产业子系统指标体系,以期全面准确地衡量出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参考钱力[20]、赵东[21]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分类方法,选取了红色文化、工业文化等6个一级指标,旨在全面覆盖物质与非物质、可移动与不可移动资源,体现其“存量”与“价值”属性。为了进一步细化评估,选取了与之对应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15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历史文化资源测度指标体系,见表1。同时,借鉴詹绍文等[22]的研究,选取了条件性资源、主体性资源和发展性资源3个一级指标,文博基础设施等6个二级指标和文化事业机构数等15个三级指标,构建了文博产业测度体系,见表2,以科学反映文博产业的发展态势和总体水平。所有指标的选取充分结合了辽宁省的特色与数据的可得性。辽宁作为工业重镇和抗战起始地,其“工业文化”与“红色文化”资源地位突出,故设置“国家工业遗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特色指标。

#### 2.3.2 指标权重和综合评价指数计算

采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采用综合评价法计算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具体步骤如下。

**表1 历史文化资源测度指标及指标权重**

| 一级指标 | 一级指标权重/% | 二级指标 | 单位 | 二级指标权重/% | 指标属性 |
|---|---|---|---|---|---|
| 红色资源 | 34.97 |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 个 | 22.64 | 正 |
| | | 党史教育基地 | 个 | 7.02 | 正 |
| | | 可移动革命文物 | 件/套 | 2.66 | 正 |
| | |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遗迹 | 处 | 2.66 | 正 |
| 工业文化 | 9.70 | 国家工业遗产 | 处 | 9.70 | 正 |
| 民俗文化 | 4.78 | 非物质文化遗产 | 个 | 4.78 | 正 |
| 宗教文化 | 8.44 | 古墓葬数 | 处 | 4.22 | 正 |
| | | 石窟寺 | 处 | 4.22 | 正 |
| 古籍文献 | 19.56 | 可移动文物 | 件/套 | 10.45 | 正 |
| | | 全省珍贵古籍数 | 册 | 4.43 | 正 |
| | | 全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 处 | 4.68 | 正 |
| 文化遗迹 | 22.55 |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处 | 1.43 | 正 |
| | |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 处 | 17.20 | 正 |
| | | 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 处 | 2.66 | 正 |
| | |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 处 | 1.26 | 正 |

**表2 文博产业测度指标及指标权重**

|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二级指标权重/% | 三级指标 | 单位 | 三级指标权重/% | 指标属性 |
|---|---|---|---|---|---|---|
| 条件性资源 | 文博基础设施 | 21.51 | 文化事业机构数 | 个 | 4.28 | 正 |
| | | | 博物馆数 | 个 | 3.20 | 正 |
| | | | 文化馆、艺术馆数 | 个 | 4.28 | 正 |
| | | | 艺术表演团体机构数 | 个 | 5.35 | 正 |
| | | | 艺术表演场所 | 个 | 4.40 | 正 |
| | 区域交通条件 | 17.18 | 客运量 | 万人 | 4.27 | 正 |
| | | | 铁路客运量 | 万人 | 3.18 | 正 |
| | | | 公路客运量 | 万人 | 4.68 | 正 |
| | | | 水路客运量 | 万人 | 5.06 | 正 |
| 主体性资源 | 文博人力资源 | 11.70 | 博物馆从业人数 | 万 | 5.52 | 正 |
| | | | 博物馆参观人次 | 万人次 | 6.17 | 正 |
| | 文博市场规模 | 18.90 |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 | 万场次 | 10.77 | 正 |
| | | | 艺术表演场馆演出场次 | 千场次 | 8.13 | 正 |
| 发展性资源 | 文博品质资源 | 30.71 | 博物馆藏品数 | 件/套 | 3.35 | 正 |
| | | | 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 个 | 27.36 | 正 |

(1)测度指标的标准化及非负化处理。在进行测度前,需要将所选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因单位不同而产生的影响,确保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

正向指标:

$$Y_{ij}=\frac{X_{ij}-m_j}{M_j-m_j}+0.000\ 1 \tag{1}$$

逆向指标:

$$Y_{ij}=\frac{M_j-X_{ij}}{M_j-m_j}+0.000\ 1 \tag{2}$$

式中:$X_{ij}$ 为指标原始值;$M_j$ 为 $X_{ij}$ 的最大值;$m_j$ 为 $X_{ij}$ 的最小值;$Y_{ij}$ 为标准化数值。

(2)计算第 $i$ 项指标的信息熵 $E_{ij}$。

$$E_{ij}=-\frac{1}{\ln n}\sum_{i=1}^{n}p_{ij}\ln p_{ij},\ E_{ij}\in[0,1] \tag{3}$$

式中:$p_{ij}$ 为第 $i$ 项指标在第 $j$ 年所占比重。

(3)计算第 $j$ 项指标权重值 $W_j$,公式为

$$W_j=\frac{1-E_j}{\sum_{j=1}^{m}(1-E_j)} \tag{4}$$

(4)计算综合评价指数 $S_k$。历史文化资源综合评价指数 $S_1$ 和文博产业的综合评价指数 $S_2$ 计算公式为

$$S_k=\sum_{j=1}^{m}W_jY_j,\ k=1,2 \tag{5}$$

2.3.3　稳健性检验

通过对指标权重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在假定所有指标层得分均已标准化的前提下,计算综合得分 $S=\sum$(准则层权重)。结果表明,历史文化资源系统 $X$ 的总分变动区间为 −0.84%～3.5%,文博产业系统 $Y$ 的总分变动区间为 −1.17%～3.07%。两个系统的波动幅度均未超过 ±5%,说明权重分配较为合理,模型具有较高的稳健性(表 3)。

**表 3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准则层权重的敏感性分析结果**

| 准则层 | 原权重 | 调整后权重(+10%) | 总分变化(+10%) | 调整后权重(−10%) | 总分变化(−10%) | 波动幅度/% |
|---|---|---|---|---|---|---|
| $X_1$ | 0.350 | 0.385 | +0.035 0 | 0.315 | −0.035 0 | ±3.5 |
| $X_2$ | 0.097 | 0.107 | +0.009 7 | 0.087 | −0.009 7 | ±0.97 |
| $X_3$ | 0.048 | 0.053 | +0.004 8 | 0.043 | −0.004 8 | ±0.48 |
| $X_4$ | 0.084 | 0.092 | +0.008 4 | 0.076 | −0.008 4 | ±0.84 |
| $X_5$ | 0.196 | 0.216 | +0.019 6 | 0.176 | −0.019 6 | ±1.96 |
| $X_6$ | 0.226 | 0.249 | +0.022 6 | 0.203 | −0.022 6 | ±2.26 |
| $Y_1$ | 0.215 | 0.237 | +0.021 5 | 0.194 | −0.021 5 | ±2.15 |
| $Y_2$ | 0.172 | 0.189 | +0.017 2 | 0.155 | −0.017 2 | ±1.72 |
| $Y_3$ | 0.117 | 0.129 | +0.011 7 | 0.105 | −0.011 7 | ±1.17 |
| $Y_4$ | 0.189 | 0.208 | +0.018 9 | 0.170 | −0.018 9 | ±1.89 |
| $Y_5$ | 0.307 | 0.338 | +0.030 7 | 0.276 | −0.030 7 | ±3.07 |

注:+10% 和 −10% 分别表示在基准情景的基础上,对某个关键输入参数进行正向调整(增加 10%)和负向调整(减少 10%)。

2.3.4　耦合协调度模型

参考物理学的容量耦合模型,构建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耦合协调度测算模型:

$$\begin{cases}D=\sqrt{CT}\\ C=\left[\dfrac{S_1S_2}{[(S_1+S_2)/2]^2}\right]^{1/2},\ T=\alpha S_1+\beta S_2\end{cases} \tag{6}$$

式中:$C$($C\in[0,1]$)表示耦合度,反映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C$ 值越大,表明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越强;$T$ 为综合度,反映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综合发展水平,$T$ 值越大,表明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发展越好;$\alpha$ 和 $\beta$ 分别为待定系数,考虑到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子系统的重要程度一样,将 $\alpha$、$\beta$ 均赋值为 0.5;$D$($D\in[0,1]$)为耦合协调度,反映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D$ 值越大,表明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之间协调度越高、发展越均衡。为了便于辨识和比较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发展的耦合协调性,借鉴廖重斌[23]的研究成果,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来划分耦合协调度的等级(表 4)。

**表 4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 协调度 $D$ | 协调等级 | 协调度 $D$ | 协调等级 |
|---|---|---|---|
| 0.00～0.09 | 极度失调 | 0.50～0.59 | 勉强协调 |
| 0.10～0.19 | 严重失调 | 0.60～0.69 | 初级协调 |
| 0.20～0.29 | 中度失调 | 0.70～0.79 | 中级协调 |
| 0.30～0.39 | 轻度失调 | 0.80～0.89 | 良好协调 |
| 0.40～0.49 | 濒临失调 | 0.90～1.00 | 优质协调 |

## 3　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辽宁省 2012—2022 年统计数据,对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测度指标进行耦合协调计算,得出 2012—2022 年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所有变化值,见表 5。

**表 5　2012—2022 年辽宁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耦合协调度**

| 年份 | $S_1$ | $S_2$ | $C$ | $D$ | 耦合等级 |
|---|---|---|---|---|---|
| 2012 | 0.325 | 0.053 | 0.696 | 0.363 | 轻度失调 |
| 2013 | 0.307 | 0.076 | 0.798 | 0.391 | 轻度失调 |
| 2014 | 0.297 | 0.103 | 0.874 | 0.418 | 濒临失调 |
| 2015 | 0.373 | 0.265 | 0.986 | 0.561 | 勉强协调 |
| 2016 | 0.442 | 0.293 | 0.979 | 0.600 | 初级协调 |
| 2017 | 0.400 | 0.350 | 0.998 | 0.612 | 初级协调 |
| 2018 | 0.376 | 0.472 | 0.993 | 0.649 | 初级协调 |
| 2019 | 0.511 | 0.502 | 1.000 | 0.712 | 中级协调 |
| 2020 | 0.325 | 0.722 | 0.925 | 0.696 | 初级协调 |
| 2021 | 0.488 | 0.859 | 0.961 | 0.805 | 良好协调 |
| 2022 | 0.539 | 0.947 | 0.962 | 0.845 | 良好协调 |

### 3.1 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依据前面介绍的方法和数据,计算 2012—2022 年辽宁省历史文化资源综合评价值 $S_1$ 和文博产业综合评价值 $S_2$(表 5 和图 2)。数据显示,辽宁省历史文化资源系统的发展总体呈现出一种持续上升的趋势,综合评价值由 2012 年的 0.053 上升至 2022 年的 0.947。2012—2014 年历史文化资源系统的评价综合值小幅上升,2014—2015 年迎来第一个快速发展时段,此后 2015—2019 年保持中速增长,评价值稳步升高,直至 2019—2022 年第二次显著提升,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历史文化资源依托物质载体、精神内涵以及社会经济环境而得以传承和发展。在发展初期,由于受到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辽宁历史遗迹遗址保护和开发较为缓慢。2014 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并出台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法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依法保护、科学保护、全民保护的稳健发展阶段。辽宁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加大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特别是在抗战纪念设施和遗址等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保护与管理工作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使得历史文化资源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和发展,迎来了第一次快速发展期。此后,辽宁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以文化强省为己任,注重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制度法规体系,初步构建了由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构成的点、线、面相结合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辽宁历史文化资源综合评价指数呈现出了显著提升,2020 年评价综合值跃升至 0.722,此后历史文化资源的发展势头更加向好。

从文博产业的综合评价值来看,辽宁省文博产业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一种上升与波动并存的复杂态势。整体而言,文博产业的发展缓慢上升,但其发展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具体来说,2017 年之前,辽宁省文博产业的综合评价值还能够保持在历史文化资源之上,之后文博产业的综合评价值开始逐渐落后于历史文化资源。近 10 年的发展中,文博产业出现了 3 个明显的低谷转折点,这些转折点分别出现在 2014 年、2018 年和 2022 年。2014 年,艺术市场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市场转型风暴。这场转型不仅导致了市场行情的持续低迷[24],而且使得艺术表演场所的数量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了大幅度的锐减。这一变化无疑对整个文博产业产生了影响,让原本蓬勃发展的产业陷入了短暂的停滞期。到了 2018 年文博产业再次遭遇了新的挑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网络空间中的乱象开始逐渐显现,这些乱象不仅扰乱了网络秩序,更助长了文化快餐式消费的蔓延。这种消费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人群对于文化娱乐的即时需求,但却严重削弱了人们对于深度文化体验的兴趣和耐心,从而给文博产业带来了新的冲击。

### 3.2 耦合度分析

依据耦合协调模型,计算 2012—2022 年历史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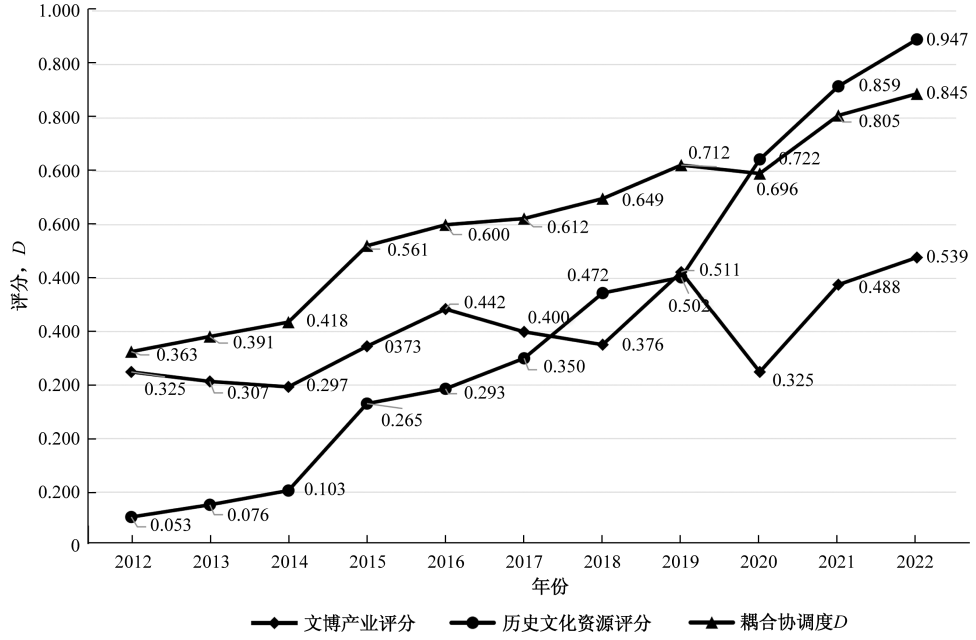



图 2 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评分及耦合协调度

化资源和文博产业之间的耦合度 $C$，见表5。可以发现，历史文化资源系统与文博产业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正呈现出一种上升且逐渐稳健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所反映出的耦合度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除2012年和2013年的耦合度接近0.8外，2014年耦合度达到0.874，2015—2022年的耦合度稳定在0.9以上，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说明辽宁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博产业两个系统之间具备较好的耦合基础，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具有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关系。这得益于辽宁省政府近年来高度重视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博产业的融合发展，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支持文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不仅着眼于宏观层面的战略规划与产业布局，更在微观层面注重资源的有效整合与规范利用，从而为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在这些政策措施的推动下，辽宁省的文博资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整合与优化，历史文化资源得以更加充分的挖掘与利用，文博产业也因此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在政策的引导下不断得到强化，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但是，具有高水平的耦合度并不说明能够实现高水平的协调发展，根据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公式，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不仅与耦合度有关，还与系统的协调度有关，即与系统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如果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较低，那么系统之间依然不能实现高水平的协调发展。

### 3.3 耦合协调度分析

从整体上来看，辽宁省的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系统的耦合协调性呈现出逐步改善和优化的动态过程。10年间，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可以细分为6个不同的阶段。具体来说，2012—2013年，辽宁省的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系统处于轻度失调阶段，这意味着两者之间的资源利用、功能对接以及市场响应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匹配，未能形成有效的协同效应。然而，随着辽宁省政府对文博产业重视程度的提升以及相关政策措施的逐步实施，到2014年，这一状况有所改善，系统间关系进入濒临失调阶段，预示着向更加协调方向发展的可能性。2015年，经过一系列政策调整与资源优化，两者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达到了勉强协调阶段，尽管仍存在一些挑战与不足，但这一阶段的突破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后，2016—2018年初，辽宁省的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系统进入了初级协调阶段。在这一阶段，两者之间的融合程度显著加深，资源互补、市场共享以及文化创新等方面的协同效应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019—2020年，随着辽宁省文旅融合战略的深入实施，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显著提升，迈入了中级协调阶段。在此阶段，两者之间的资源互补、市场共享、文化创新等方面的协同效应显著增强，为辽宁省的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021—2022年，辽宁省的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系统实现了质的飞跃，达到了良好协调阶段。两者不仅实现了深度的融合与互动，更在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现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10年间，辽宁省的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系统逐步从一种无序、分散的状态转变为有序、协同的发展模式，展现出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尽管如此，这两个系统之间仍有向更优质协调发展的进步空间。未来，辽宁省应继续深化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博产业的耦合关系，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创新驱动，提升服务质量，以更高的标准、更宽的视野推动两个系统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共同开创辽宁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 4 结论与建议

分析了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的耦合机理，分别构建了辽宁省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的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辽宁省2012—2022年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的耦合发展程度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辽宁省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博产业综合评价指数逐年上升，文博产业综合评价指数小于历史文化资源综合评价指数；辽宁省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耦合度在0.9以上，具有较好的耦合协调基础；2012—2022年，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等级逐步提高，由轻度失调进入到良好协调阶段，具有向优质协调发展的提升空间，应针对现状加强两系统间的协调以促进其深度融合。因此结合研究发现和辽宁省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发展实践，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资源整合与文化挖掘。辽宁省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但在保护、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存在资源分散、整合不足的问题，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同时，文博产业在挖掘和转化历史文化资源时，也面临着

创意不足、技术瓶颈等挑战,限制了文化产品的创新和市场竞争力。为促进辽宁省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的融合发展,首先做好历史文化资源的整合与挖掘。通过先进的科技手段和专业技术团队,对全省范围内的历史文物进行系统性保护,确保历史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原生性。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的文化内涵,建立辽宁省历史文化资源信息库,为文博产业提供丰富的内容支撑。在资源整合与文化挖掘的过程中,根据资源的分布特点和价值,结合市场需求与产业发展趋势,合理规划文博项目的布局,避免同质化竞争,提升文博项目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促进辽宁省文博产业的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2)创新驱动与产业融合。文博产业的创新驱动与升级不仅是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更是实现历史文化资源传承与保护的重要途径。在此层面上,应构建系统化的数字文博技术实施路径与产学研协同机制。技术路径上,可遵循“资源数字化-体验沉浸化-服务智能化”的递进逻辑,分阶段推进。首先利用高精度三维扫描与摄影测量技术完成文化遗产的基础数字化建档,构建标准化资源库;进而依托数字化技术等开发沉浸式展览与虚拟数字孪生空间,实现文化体验的时空跨越;最终引入人工智能与知识图谱技术,打造智能导览与研究辅助平台,实现知识服务的深度赋能。机制设计上,建议成立由文旅、工信、教育等多部门协同的“文博产业融合创新中心”,负责发布技术需求清单、组织创新赛会、搭建 IP 授权平台,以此引导科技、创意与企业资本等要素汇聚,推动文博与文创、旅游、教育产业的深度融合。此外,还应注重文博产业的国际化发展,通过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举办国际展览与论坛等方式,向世界展示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创新成果,提升辽宁文博产业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3)政策扶持与市场拓展。辽宁省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高质量的耦合协调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产业规划。因而政策环境优化与市场机制创新成为促进辽宁省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保障。由于历史文化资源传承开发产业化的特殊性,政府需要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建立高层次的“文博强省建设”制度,统筹文旅、文物、财政、科技等关键部门,旨在破解行政壁垒,协同制定产业规划、审议重大技术路线图,并建立统一的统计监测体系。政策供给需从事前补贴、事中扶持到事后评估进行全周期设计,具体包括设立政府引导的产业融合发展基金以吸引社会资本,实施文博单位数字化升级专项补贴,并将数字文博人才纳入引进目录,为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融合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健全文博产业的法律法规体系,保障文博企业的合法权益。在市场机制创新方面,应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文博产业,推动文博企业与金融机构、科技企业的深度合作,积极拓展与电商、短视频及在线旅游平台的战略合作,通过数据驱动的精准营销和创新消费场景设计,提升文化资源的市场转化效率与品牌影响力,形成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与创新合作机制。此外,还需加强市场研究,准确把握消费者需求与市场趋势,通过市场调研、数据分析等手段,为文博产品的开发与推广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政策环境优化与市场机制创新的双重推动,辽宁省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博产业的融合发展将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为文化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 参考文献


[1] GOURLEY S R. Towards ethical stewardship: balancing natural and historic cultural resources in national parks [J]. Virginia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2017, 35(3): 522-565.

[2] ALISON E. Cultural heritag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impacts of craft breweries in Pennsylvania[J].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2017(9): 21-30.

[3] PEARSON N. THOMPSON B S. Saving two fish with one wreck: maximizing synergies in marin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J]. Marine Policy, 2023, 152: 105613.

[4] 张斓琪. 历史文化资源在陕西旅游开发中的利用与保护研究[J]. 西部旅游, 2024(1): 11-13.

[5] 陶善才.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桐城模式[J]. 决策, 2022(4): 55-57.

[6] 张荣华. 数字化生存下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J]. 文化产业, 2021(24): 104-106.

[7] 王小霜. 数字化背景下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J]. 炎黄地理, 2022(9): 56-58.

[8] 谢宏洋, 李舒. “智”化媒介可供性视角下辽宁红色文化数字资源传播策略[J]. 科技和产业, 2025, 25 (7): 190-196.

[9] 许瞳, 章佳. 基于 CAVE 系统设计的绍兴历史文化街区活化研究[J]. 科技和产业, 2023, 23(11): 148-151.

[10] 臧志彭, 伍倩颖. 世界四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结构演化比较: 基于 2001-2016 年全球文创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1):

34-43.
[11] KALFAS D, KALOGIANNIDIS S, AMBAS V, et al. Contribu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a European perspective[J]. Urban Science, 2024, 8(2): 39.
[12] 梁雪. 关于文博创意产业发展的实践与思考[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1(18): 85-87.
[13] 张萌. 山东省文博产业创新性发展研究[J]. 现代商业, 2017(16): 61-63.
[14] 张振. 文博创意产业发展及产品开发模式探索[J]. 大庆社会科学, 2022(6): 119-122.
[15] 黄磊. 文博专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研究[J]. 中原文化与旅游, 2025(5): 69-71.
[16] 王青. "文博旅"融合发展赋能县域经济增长[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5(8): 39-41.
[17] 毕颖华. 基于文博行业 IP 定制的沉浸式 VR 体验技术研发与应用研究: 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 VR 体验中心为例[J]. 科技和产业, 2021, 21(5): 270-276.
[18] 顾斯豪. 虚拟现实技术在文博产业中的应用效果[J]. 黑龙江科学, 2024, 15(13): 123-125.
[19] 解学芳, 张家淑. 中国式文博元宇宙创新路径研究[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4): 18-29.
[20] 钱力. 安源历史文化资源分类判别与整合开发探析[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3, 7(2): 184-188.
[21] 赵东. 陕西历史文化资源的特性与类型[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4, 27(6): 101-104.
[22] 詹绍文, 李明悦, 李今今. 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J]. 科学与管理, 2021, 41(4): 81-87.
[23] 廖重斌.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 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 热带地理, 1999(2): 76-82.
[24] 阮富春. 行情持续低迷当代艺术艰难转型[J]. 文物天地, 2015(4): 104-108.

# Research on Coupl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Relics Industry in Liaoning Province under Background of a "Cultural Power"

ZHANG Xiaonan, WEI Linlin

(School of Management,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00,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and museum industr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enhancing the soft power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and museum industries was analyzed,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model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and museum industries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and museum industries in Liaoning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22 were calc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and museum industries in Liaoning is on the rise, and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cultural and museum industries is less than that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and museum industries has steadily evolved and has entered a stage of goo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word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cultural and museum industry;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